

给人的烦恼、愧疚、无力与恐怖的体验,更是具有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与以前作品中的人物的怨忿不满、牢骚愤激、无可奈何不同,李济运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烦恼疲惫、愧疚痛心、如履薄冰的恐怖之感。如果说,愤懑不平只是自己地位与境遇不如人意的话,起码官场还有着其值得认同与追求的东西在,而《苍黄》中则让李济运整个地陷入到了痛苦之中。乡党委书记刘星明是其老同学,因做差配而疯狂自杀;物质局长舒泽光是其老熟人,因拒绝做差配而被整自杀;财政局长李济发是其堂兄,因矿难而莫名其妙地失踪;父母因对聚赌之事稍有微词,就遭到炸弹袭击差点命丧黄泉……这些虽然不直接与他相关,但无不与他有关,这些事件的巨大压力让他无法面对陈美,无法面对舒芳芳,无法面对同学、朋友、兄弟、父母与乡亲……他常常感到精疲力竭,感到是在“无边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感到“人想瘫下去。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感到“自己很卑劣,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流。”作为权力场中人如此,权力场外的百姓又何以堪……可以说,权力批判到《苍黄》中不是一般意义的尖锐与锋芒,而是一种沉重的苍凉与悲郁了……

“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打出欢迎舒泽光清清白白回家横幅的普通职工,坚持上访的刘大亮,一起扳倒刘星明的阳明、

李济运等,散发各种各样的舆论与帖子的底层声音……虽然其不一定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但却是推进民主、获取自由的抗争性力量,这些书写也是王跃文先前小说中所没有的因子,它也启示着其创作表现的新的可能性……■

【注释】

王跃文:《〈国画〉琐语》,载《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王跃文:《拒绝游戏(代后记)》,见《国画》,49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王跃文:《二十年小说创作之检讨》,载《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2期。

夏义生、龙永干:《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王跃文访谈录》,载《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

丹尼斯·朗:《权力论》,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译,91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6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龙永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

个人主义的颓废

——细读谈瀛洲《灵魂的两驾马车》

刘春 黄平

当代文学评论家长根曾经的学生、也是曾经的暗恋对象谷薇留校任教,有急事无法上课,打来电话求救:“我正在给他们讲郁达夫的《迷羊》。我记得你以前给我们讲过这篇小说,讲得很动人。”长根应允下来,作为“颓废主义”的研究专家,讲讲郁达夫,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细节来自谈瀛洲近作《灵魂的两驾马车》,在新世纪以来的大学题材小说中,这是笔者所见最新的一部。和以往的同类题材类似,主人公毫无学者的超然

与睿智,而是身陷在世俗的泥沼中,触目皆是愚蠢市侩的同行、钩心斗角的文坛、窒息灰暗的婚姻、败落凋敝的故乡,以及充满魅力的蛇蝎般的外遇。不过,谈瀛洲的这部作品和风俗画的描写有所区别,这不是那类可以充当“大学腐败指南”的问题小说,而是侧重于一个颓废的灵魂的精神遭遇。

在《灵魂的两驾马车》中,郁达夫所指代的“颓废文学”的谱系反复出现。长根作为当代文学评论家,觉得当代的作品太糟糕了,无法写出一流的评论文章,相反,他

想研究徐志摩、郁达夫、邵洵美这批作家,同行郑教授劝他:“但你为什么要提出一个研究中国的唯美主义运动和‘颓加荡’的项目呢?还有王尔德和波德莱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等。谁会愿意给你钱,让你去研究‘颓加荡’呢?”掌握着项目审批大权的同行虽然不喜欢“颓加荡”,但是长根的女学生喜欢,谷薇表示:“都是因为你,我们才会去读了邵洵美的那些灵感来自于波德莱尔的诗,徐志摩的那些关于英国唯美主义的散文,还有郁达夫的那些颓废小说。其他老师绝不会让我们读这些的,至少不是在课堂上。我们中的许多人,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现代文学的。”长根的“颓废”,在谷薇那里意味着“帅”与“吸引力”。

这是并不遥远的一种叙述模式的循环,2013年的《灵魂的两驾马车》,重复着1993年惹起轩然大波的《废都》的叙述模式。颓废的知识分子,以及一系列颓废的外遇。对于这类叙述模式,以往有两种批评框架:其一是在“问题小说”的意义上,将小说读成透明化的文本,变成一沓佐证知识分子堕落的材料。这其实是以社会新闻的方式读小说,这类情节固然在一些情节上比如“师生恋”“项目腐败”可以和社会新闻彼此印证,但不能抽离出来作为“呈堂罪证”,而是小说形式化的一部分。孤立地读、概括地读,将小说完全变成“内容”来读,不是文学批评的正道。其二是在“道德批判”的意义上,基于种种神圣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在这种道德审判下,这类作品无疑有诲淫诲盗的嫌疑。《废都》最后被查禁的一个理由,就在于“有害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这两种读法,都是“前理论”的读法,之所以连小说中的长根都觉得当代文学批评没什么价值,就在于大量业余状态下的“读后感”以文学批评的面目出现。笔者不会在“问题小说”与“道德批判”的层面上来读,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颓废”在90年代初期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出现后,一直风行不息,宰制着近二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叙述。这不能由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堕落来简单说明,且不说庄之蝶与长根之类知识分子的行状是否可以涵盖当下的知识生态,就算承认知识分子的堕落史久矣,但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比如20世纪40年代或80年代——是全然不同的想象?

笔者同意卡林内斯库的看法,“颓废”是现代的产物,是现代性的面孔之一。对于狂飙突进的现代性,颓废者不是在“进步”的意义上予以理解,而是相反,将时间视为一种“衰退过程”,“将变化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原始状态中堕落。”这种感觉结构不是简单地回重复古希腊或古代中国的类似感知,而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诚

如卡林内斯库所言,“一方面是现代性和进步的概念,另一方面是颓废的概念,两者只有在最粗浅的理解中才会互相排斥。”

真切地把握“颓废”,不能把“颓废”仅仅视为一种美学风格,而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精神不适症”。《灵魂的两驾马车》在文体上是现实主义式的,但在精神向度上是颓废主义的。在小说中,长根对于现代的高速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不适症:“生活在中国历史的这个特殊阶段,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如此快速的变化……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有时在人的生活的一两个方面发生些变化还是不错的,但当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变化的时候,长根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他的神经系统有些受不了。”在《废都》中,庄之蝶对抗猛烈的现代性的方式,是设置了一个前现代的神话,一个超越颓废的乡土家园,他将自己对位于小说中那头来自终南山的老牛。而在《灵魂的两驾马车》中,长根尽管也来自乡村,但家园已经沉陷(小说多次写到家乡的败落、父亲的疾病、兄弟的猜忌),他设置了一个理想的自我,从学术体制中退出,写小说而不再写评论。长根为自己这个隐秘的梦想激动不已,但这并非基于对于文学的热爱,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长根并无文学天赋。他之所以激动,在于厌弃现代性体制中的自己:一所名校的年轻正教授。在长根眼中,教授这个头衔无法给予他意义,大学不过是现代性知识生产中一套可厌的科层制系统,“他把他的青春,都花在了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上面,写了无数论文,填了无数表格,从助教开始,又陆续评上了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如果学术的阶梯上再多几级,他也会爬上去的。可是在爬上了学术的金字塔顶之后,他发现他俯视的不过是一片沙漠。”大学对于长根,意味着“青春”“生活”“人性”的反义词,而且更糟的是,大学这套科层体制在现代性中还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现在已是正教授,这是大学职称阶梯上的最高一级,但他知道这在他老婆的那个由总裁、总监、总经理等组成的、拿着高工资的白领体系里这算不了什么。”

经济与意义的双重匮乏,使得长根不堪“自我”的重负,他无法承担“自我”这个角色在现代性体制中的一系列责任。和《废都》中的庄之蝶相似,长根也希望取消自我。“庄之蝶”这个名字意味着庄生与蝶互相转换,幻梦无穷,无法辨别实体。而长根则希望自己变成一块太湖石:“他们所渴望达到的,正是石头的这种外表玲珑,却内心混沌,无知无觉的状态啊。”^⑩

值得注意的是,长根并非不爱自我,而是太爱“自我”,爱到推卸掉“超我”(super-ego)对于“自我”(ego)的

一切限定。和庄之蝶一样,当长根从作家、学者这类自我角色的限定中退却出来的时刻,他要为自己的所谓真实的生命,寻找一个突破的出口。这是长根一系列外遇的开始,他先是爱上了做颓废状的、写着《夜的孩子》之类的年轻女作家文艳,合乎逻辑,他们第一次的约会,是在笼罩着颓废气氛的酒吧中:“酒吧是按‘怀旧’的风格装饰的。一切都是为了唤起关于1930年代的记忆: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那短短的一段繁荣期里,中国的颓废和西方的放纵,在这里发生了碰撞。”^⑫

这场外遇从开场就是反讽性的,呈现出一系列荒唐的悖论:长根怀揣着幼稚的理想,以为文艳牺牲中产阶级生活以忠实于艺术,结果发现文艳的颓废写作不过是推销的手段;文艳本想利用长根的评论,最终反而激发起她疯狂的欲望——一半是情欲,一半是占有欲。当长根想结束这段黑暗的感情时,文艳像疯子一样向长根的家庭发起一次次冲击,这是小说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段落,长根阳光下的一切都濒临毁灭,直至文艳傍上了新的文坛大佬。

然而,长根不是受害者,这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而是他和文艳骨子里是相似的,他们都是疯狂的个人主义者——只不过长根是真颓废,而文艳是装作颓废。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长根曾经讲过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我曾经想梳理一下明清两代的文学评论,那都是散见于个人的文集与作品里面的。我觉得那是个极为有趣的时代,是个体意识开始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一个时代。我觉得那是个没有经过充分研究的领域。”^⑬个体化的颓废,这对于理解长根的颓废至关重要。诚如长根一系列外遇的驱动力在于,“他满足了其他人对他的期望,但他并没有满足他对自己的期望。”^⑭

卡里内斯库指出过,个人主义是颓废的核心,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概念居于任何颓废定义的核心”。^⑮这种个人主义的颓废,不仅决定了小说的伦理内涵,也决定了小说的形式特征,换句话说,二者其实是一致的,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即意味着叙述伦理。《灵魂的两驾马车》这部作品,核心的叙述形式是“闪回”,全知叙述人不断讲述长根的现实遭遇,同时不断插入长根的回忆。比如,长根与童年时的玩伴发根聚会,他其实并不在意这些朋友,不关心他们现在的生活与内心的世界,他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中。双方见面后,作者以十一页的篇幅来回叙长根的童年往事,直到朋友们拍着长根的肩膀唤醒他,“嗨,长根,跟我们在一起很无聊吗?”^⑯

《灵魂的两驾马车》这部小说的篇幅约有十三万字,只有一个叙述视点,也即长根的视点,其他的人与事

只有进入长根的视野中,才是有意义的,没有人可以离开长根的视点而独立讲述,长根的视点控制着现实,也控制着回忆。这种极度个人主义的叙述,与长根对于个体意识的迷恋是一致的。而这种个体意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呼应着当代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原子化的历史进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颓废,在中国曾经有着批判的面向,任何经历过1980年代的读者对此都不会陌生。卡里内斯库也引用过马拉美的名句“在社会面前罢工是现代诗人的职分”,指出颓废并未与实际生活隔离,与介入社会并不矛盾。^⑰然而自从《废都》以来的颓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阉割,丧失了社会介入的维度,一个个知识分子,流连于浓郁的自私自恋。放弃了颓废的批判这一面的个人主义,全然丧失了对于欲望的控制。颓废的文人生活充斥着一场又一场偷情,也并不值得奇怪了。

怎么重建颓废的形而上维度,构成了摆在中国特色的颓废的知识分子面前的挑战。小说结尾,长根飞往加拿大,试图与定居在此的妻子与孩子修复关系。妻子素芬此刻已经找到宗教的慰藉,而长根很不适应,他不习惯在“大我”面前放弃自己的“小我”,执拗于所谓的聪明来辩论,认为《圣经》不过是讽喻性的文学。殊不知他的宗教辩论与他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一样浅薄浮泛。他只有一点点小聪明,而没有智慧,他太爱自己了。

作为小说的关键,作者安排长根带着失落飞回上海,这时童年好友打来电话,告之一位好友玉文要来上海参加世博会的活动,通过长根的回忆我们得知,玉文是他成长岁月中最重要的灵魂伴侣。放下宝根的电话,长根再次陷入对于往事的回忆,他回忆起在家乡县城的新华书店中读到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之《斐德若篇》:

他把这些字句读了又读,还把它们抄写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尽管他已经买了那本书,他想读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读。他觉得手抄一遍可以让他更长久地体味这些美妙的字句,可以让他更深地理解它们,并再度确认他对语文的情感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

在这之后很久,他才意识到书籍对形成和表述一个人的经验有多大的作用。是柏拉图赋予了他的内心体验以形式、意义与重要性。

在玉文被赶出学校之后,长根又拿出了他的笔记本,慢慢地读着他从《斐德若篇》抄下的那些句子:

“我把灵魂划分为三个部分:两部分像两匹马,第三部分像一个御车人……这两匹马之中一匹

驯良,一匹顽劣……”^⑩

作者在此为什么有意安排长根回忆《裴德若篇》?《裴德若篇》讲的是苏格拉底与朋友裴德若(王晓朝版的《柏拉图全集》中译为裴德罗)出城散步,裴德若赞扬起吕西亚斯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以一位美少年受到诱惑讲起,从男性间的同性之爱来讲什么是爱。无疑,这篇对话呼应着长根隐秘的内心,他发现自己就有同性恋的一面,他秘密地爱着玉文。

更重要的是,《裴德若篇》是人类思想史上著名的对于何谓爱、何谓灵魂的辩论,柏拉图所引述的苏格拉底,反对吕西亚斯所认为的爱是肉体的欲望,“在苏格拉底看来,爱是一种冲动,充满着美与善,是一种提升灵魂、使之能够踏上通往真理之路的神圣的迷狂。”^⑪长根自以为“柏拉图赋予了他的内心体验以形式、意义与重要性”,但他没有读懂《裴德若篇》,他只是停留在“若是他离开了那爱人,灵魂就失去滋润,他的毛根就干枯”这类感性的阅读层面,而没有读懂“羽毛”在苏格拉底看来意味着灵魂用以飞升的翅膀,滋养灵魂的爱不是肉体之美,而是“超越的东西”。

灵魂的两驾马车,在苏格拉底看来是要勒住代表欲望(“本我”的层面)的顽劣之马。苏格拉底在论述灵魂的两驾马车之前,作为理想状态的对照,讲过诸神的一驾马车,只有爱好荣誉、谦逊且节制的良马,没有凡人灵魂中的劣马。相反,长根以为理解了《裴德若篇》,但其实是以吕西亚斯的方式来理解的,惋惜的是劣马被勒住了:“长根对自己说,是猛拉缰绳的时候了。……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实在是太年轻了。现在的他意识到,他对玉文的情感,只不过是—一个人在青春时代会经历的情感风暴的入门式。也许他在那时对自己施加的意志的暴力,让他永久地失去了部分爱人的能力?”^⑫

长根的颓废是彻头彻尾的,他灵魂中的劣马奔驰而出,践踏着一切妨碍的东西,这种既懦弱又残暴的自私,毁灭着一切救赎的可能。重温青春岁月中灵魂的两驾马车,成为长根再一次出轨的动力,顽劣的那匹马又开始奔跑了。这一次是谷薇,自己过去的学生与现在的同事,良马与劣马稍稍搏斗了一下,就被长根自私到骨子里的颓废所打败了:“如果他离开他的妻子,那么他是在做一件可怕的事,如果他不离开他的妻子,那么他就是毁灭了自己的生活,放弃了再次享受爱情的可能,那么他也是在—做一件可怕的事。人毕竟只能活一次。”^⑬没有信仰,没有来世,所谓“人”在长根这位当代文学评论家眼中看来,不过是纯粹生理性的存在,“只能活一次”,这大概是颓废的个人主义者又疯狂又绝望的座右铭了。

小说就结束在长根疲乏而病态的生命激情中,颓废的火焰再次燃起,焚尽生命最后一点余灰。从《废都》到《灵魂的两驾马车》,在诸神退场的时代,文学能否驾驭住灵魂中的劣马,还是仅限于记录凌乱粗暴的蹄印?看得出,作者谈瀛洲已不抱幻想。小说中作者也出场了,但没有什么特权,也不过是沉沦颓败的筵席中的一位,同样只能出现在长根的视点中。长根如此打量同席的一位叫谈瀛洲的教授与评论家:

谈瀛洲英俊瘦削,头发花白,穿一套黑色的裁剪合身的西装,一双棕色的仿古皮革的皮鞋。他又从一个棕色仿古皮革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本棕色仿古皮革的笔记本,和一支鲜红色的卡地亚牌圆珠笔。他喜欢被人称为一个有品位的人。^⑭

“品位”而喜欢被人发现,连长根这个笔下的人物都可以跳出来讥讽,我们的作者已然无心无力来拉紧缰绳。这大概就是当下文学的写照,我们也许有不一样的知识分子,但还匮乏不一样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叙述,“良马”的故事尚未成形,劣马肆意地从诸神的世界中下落,跑得两耳生风。今天的御马人,正在烟尘四起的路上,徒劳地试图挽住缰绳。■

【注释】

谈瀛洲:《灵魂的两驾马车》,载《作家》2013年第12期,发表时限于篇幅约删去三万字,笔者据十三万字的未删节版。

笔者所见大致有:南翔《大学轶事》(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张者《桃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葛红兵《沙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史生荣《所谓教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宏图《风华正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等。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谈瀛洲:《灵魂的两驾马车》,载《作家》2013年第12期。

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神游人间》第3卷,7页,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⑮⑰}参见卡林内斯库引述的亨利-夏尔·皮埃什的看法,引自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后现代主义》,162、166、183、174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⑲王晓朝:《〈裴德若篇〉提要》,《柏拉图全集》第2卷,134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刘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该文系上海“晨光计划”即上海高校青年科研骨干培养计划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CG29,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